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Historical Changes of Anti-science Trends in the West

孙红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Historical Changes of Anti-science Trends in the West

孙红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 孙红霞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7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4037 - 8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社会思潮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D0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769 号

·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

著 者 / 孙红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桂 芳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 cn

责任校对 / 王伟平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 5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26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037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 任：李 扬 王晓初

副主任：晋保平 张冠梓 孙建立 夏文峰

秘书长：朝 克 吴剑英 邱春雷 胡 滨 (执行)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王 巍	王利明	王灵桂	王国刚	王建朗	厉 声
朱光磊	刘 伟	杨 光	杨 忠	李 平	李 林	李 周
李 薇	李汉林	李向阳	李培林	吴玉章	吴振武	吴恩远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昌东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卫东	金 碚	周 弘	周五一
郑秉文	房 宁	赵天晓	赵剑英	高培勇	黄 平	曹卫东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蔡 昉
蔡文兰	裴长洪	潘家华				

(二) 编辑部

主 任：张国春 刘连军 薛增朝 李晓琳

副主任：宋 娜 卢小生 高传杰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宇	吕志成	刘丹华	孙大伟	陈 颖	金 烨	曹 靖
薛万里						

序 一

博士后制度是 19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酿实施博士后制度。1985 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1992 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 2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短短 20 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

伟大创造。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实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 20 周年之际，为了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进一步发展，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反复磋商，并征求了多家设站单位的意见，决定推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一个集中、系统、全面展示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的学术平台，《文库》将成为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学术风采、扩大博士后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园地，成为调动广大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加速器，成为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领军人才的孵化器。

创新、影响和规范，是《文库》的基本追求。

我们提倡创新，首先就是要求，入选的著作应能提供经过严密论证的新结论，或者提供有助于对所述论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思路。与当前社会上一些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不同，我们不提倡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多少观点，一般地，我们甚至也不追求观点之“新”。我们需要的是有翔实的资料支撑，经过科学论证，而且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论点。对于那些缺少严格的前提设定，没有充分的资料支撑，缺乏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仅仅凭借少数来路模糊的资料和数据，便一下子导出几个很“强”的结论的论著，我们概不收录。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

我们提倡创新，还表现在研究方法之新上。这里所说的方法，显然不是指那种在时下的课题论证书中常见的老调重弹，诸如“历史与逻辑并重”、“演绎与归纳统一”之类；也不是我们在很多论文中见到的那种敷衍塞责的表述，诸如“理论与实证分析

的统一”等等。我们所说的方法，就理论研究而论，指的是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确定或建立基本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推论及其检验；就应用研究而言，则指的是根据某一理论假设，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目标，所使用的具体模型、技术、工具或程序。众所周知，在方法上求新如同在理论上创新一样，殊非易事。因此，我们亦不强求提出全新的理论方法，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要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来展开研究并构造论著。

我们支持那些有影响力的著述入选。这里说的影响力，既包括学术影响力，也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就学术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达到公认的学科高水平，要在本学科领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仍然能够为学者引用或参考。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能向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进程转化。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个转化问题。其研究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向现实政策转化，要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化，要向文化产业转化，要向人才培养转化。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发挥巨大影响，就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站在学术高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尊奉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我们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抵制各种学术不端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当此学术界世风日下之时，我们希望本《文库》能通过自己良好的学术形象，为整肃不良学风贡献力量。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 年 9 月

序 二

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

培养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更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国家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切实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力争在当代世界思想与学术的舞台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地位。

在培养和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战略与实践上，博士后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经国务

院批准于1985年开始实施的。这也是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了科学、完备的博士后制度体系，同时，形成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服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通过实施博士后制度，我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他们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依托自身优势和兴趣，自主从事开拓性、创新性研究工作，从而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突出的研究能力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其中，一些出站博士后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人才梯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可以说，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国家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重要途径，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博士后的优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但往往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这些成果不能尽快问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现实作用，着实令人痛惜。

可喜的是，今天我们在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研究成果出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科研成果，并为其提供出版资助。这一举措不仅在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上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有益于提升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的学术地位，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有益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今天，借《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与机构能够了解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领

域博士后及其研究成果，积极支持博士后工作。可以预见，我国的博士后事业也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岐山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序

李醒民

孙红霞博士的学位论文《西方反科学思潮的历史变迁》经过近乎两年的修改，即将付梓。她敦请我为之做序。我毫不迟疑，当下一口应允。对她来说，这是她就学三年有半的心血结晶，是她的处女作。她的爱怜和珍惜之情自不待言，当然希望有篇好序为之增色。就我而言，她是我的学生，我熟知她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背景的来龙与去脉，了解她写作过程的艰辛和惬意，并与她一起分享过成功的欢悦及快慰，故十分乐于写序——尽管我向来不愿在外人的论著上画蛇添足，也从未开过这个戒。

拟写好序，先得有个好一点的标题，以起画龙点睛之效。思忖良久，遽然想到三年前退休时撰写的一首小诗《辞职退课之后》：

弃案绝丝一身轻，心灵自由人之精。

究际通变吾最爱，泛舟学海任西东。

那是2009年7月1日，我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改称中国科学院大学）退休，当即辞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职务^①，

① 1981年研究生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此工作直至退休。其间，从2001年1月正式任主编，2009年7月辞去主编职务。现今，我为我29年的编辑生涯感到自豪和欣慰，故写文章总是署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有时被编者私下更改）。



退掉事先安排的新学期课程，并谢绝该院人事处的返聘，回到自己的书房“寒江雪屋”，做自己最心仪的事情——读书、研究、翻译、写作。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①，身心获得百分之百的自由。于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便成为我唯一乐在其中的事情。红霞在读研究生时就有志于学术，毕业后依旧不改初衷、孜孜不倦，像我一样时而在探究的崎岖小道上踽踽独行，时而在学问的汪洋大海里击水中流，怡然自乐于一得之愚、一孔之见。既然师生志同道合，心如止水，那就让我们一起在学海中“从流飘荡，任意东西”^③，“风雨如晦，鸡鸣不已”^④吧！

我曾经说过，我为研究生选择题目，一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选题要有恒久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选那些跟风赶潮、就事论事、没有学术生命力的题目。二是选择国内外学术界没有涉及过的论题，起码是没有系统研究过的，自主创新余地大。学生在完成论文后，就能够站在一个学术制高点上，在该论题及其相关问题上具有足够的发言权。三是通过撰写博士论文，能够熟稔问题语境，洞达思想理念，把握研究方法，扩大学术视野，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四是我本人先期做过某些研究或有所涉猎，知道题目的深浅和大致理路。”^⑤从1970年代末算起，约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我一直在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领域耕耘，手头很早就有十余个这样的选题——而我前后只招收了十名研究生，所以分配给他们绰绰有余。其中，有些还是自己准备择机研究的论题，只是由于时间不足和精力不济，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红霞甫一入学，我就给她正式定下题目，她表示很有兴趣和信心。当

① 刘禹锡：《陋室铭》。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不用说，我们今日“究际通变”，当有更新颖、更丰富的内容。

③ 吴均：《与朱元思书》。

④ 《诗经·郑风·风雨》。

⑤ 李醒民：《千里之行足下始，乐在学海风满帆——〈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变〉序》，《学术界》2011年第8期。也参见庞晓光《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17页。

时我就吃了定心丸，论文有望成功。

正如四项基本原则的第四项所言，对于反科学这个课题，我先期做过一番探究。在1980年代，我在研究批判学派^①代表人物之一的哲人科学家^②彭加勒^③时，就注意到他对反科学的明确质疑和尖锐批评。在彭加勒所处时代，有人对科学发展表示悲观，出现了一小股反科学的逆流。这些科学悲观主义者把每一种可能的邪恶与科学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科学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而只会带来祸害；他们担心科学无论从哪里经过，社会将不能幸存下去；他们对于工业发展、技术应用、电或汽车的奇迹不仅不关心，而且甚至视其为道德进步的障碍和伤风败俗的学校。作为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领袖科学家，彭加勒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错误思潮。他充分肯定科学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重大作用，作为真善美统一体的科学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够在促进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他表明：“科学能够治愈或预防不计其数的疾病”，“对科学感兴趣是神圣的”。例如，他认为科学能够消除愚昧，破除迷信。他说，宗教虽然具有摆布信仰者的巨大威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信徒，“信仰只能强加于少数人，而理性却会给一切人留下烙印。”“科学将揭露出造物主的舞台效果，从而使造物主失去他的某些威严。”他还强调，科学能够增强人们的自信心。比如天文学能使我们超然自立于我们自身之上，能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威力何其伟大，这种意识使我们更加坚强有力。他意味深长地说：“繁星不仅发出可见光，射入我们的肉眼，而且它们也发出一种十分微妙的光，照亮我们的精神。”而

① 李醒民：《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2003），第1期。李醒民：《批判学派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意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求索》1990年第5期。《世界科学》1993年第10期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李醒民：《哲人科学家：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1卷（1999年），第6期。

③ 李醒民：《理性的沉思——论彭加勒的科学思想与哲学思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李醒民：《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1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

且，科学能够使人们得到巨大的精神享受和无穷的乐趣：“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工作中体验到和艺术家一样的印象。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同样伟大的东西。”正由于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不断激发他们的热情，给他们带来欢娱，使他们摆脱悲哀，所以科学家都是“乐天派”。针对科学发展会引起道德沦丧的观点，彭加勒在“伦理和科学”等文中无情地加以批驳。他说：“科学将给伦理学家以宝贵的帮助”，“我们依靠科学使道德真理达到不容置辩的境地”，“科学能在道德教育中起十分有益的和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的规范有助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使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目标和理想。他详尽地论述道，科学能够以特殊利益服从普遍利益，把不同的个人抱负归于统一，从而使人性变得可爱；科学还能使人诚实、公正。我当时得出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成果所导致的技术发展的确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副作用：核技术的进展制造了足以毁灭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武器；医学的进步使人口增长的速度如脱缰野马；化学工业和内燃机正在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要正在耗空地球的宝藏；为了维持温饱，人们正在毁坏地球的容貌；经济的增长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因此，自1960年代以来，彭加勒时代的反科学倾向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科学和科学家成为反科学者责难和敌视的对象。然而，上述副作用并非是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不用说，科学知识所导致的技术手段有两面性（例如核电技术和核弹技术），但就科学知识本身（如质能相当性公式）而言，并不具有非人道性。把技术固有的观念上和事实上的矛盾解释为客观知识的矛盾，这是对科学的误解。何况技术手段的运用也主要取决于当权者的实际利益和指导思想。因此，要消除技术所引起的副作用，只能依靠知识而不是依靠无知，只能依靠更高级的科学而不是依靠反科学，

只能靠全人类的真诚谅解与密切合作。用取消科学的办法消除那些副作用，实无异于因噎废食。^①

1990年5月，我为《科学论译丛》之一的《科学方法讲座》写了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②的代总序。我在该文揭发反科学在学理上的缺失：当代反科学（anti-science）思潮所掀起的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the neo-romantic critique of science），固然有助于减缓和消除科学主义者所宣扬的“科学万能论”的神话以及技术的误用和恶用，但其基调则是对科学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反动。它所倡导的取消科学、回到“田园诗般的”农业文明的怀旧心绪是倒行逆施的，也是不现实的。反科学思潮的理论缺陷在于：它把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等同于自然技术（natural technology），进而把自然技术被误用或恶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自然技术本身乃至自然科学，而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是由于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或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不够发达，未能有效地约束或制止误用或恶用自然技术的人所致。更重要的是，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含义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精神及其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巨大精神价值，这更为商品社会中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文章最后强调：

科学精神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体，科学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数量衡量的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只有使科学精神变为国民的自觉意识，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才不会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

① 李醒民：《评彭加勒的科学观》，《科学学研究》第2卷（1984）第2期。

② B. N. 戈什：《科学方法讲座》，李醒民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5页。该文起初摘要发表在北京《科技日报》1990年10月23日第4版。《科技导报》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为题，在1993年第4期第22~23页全文予以转载。



是年，我发表了批驳反科学的专文，向反科学思潮正面宣战。我在文章中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出于人为的原因逐渐地偏离了它固有的规范结构，明显地打上了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的印记。尤其是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受到追逐核优势和超额利润的驱使，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环境污染日趋恶化，直接威胁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的福利。于是，这些国家的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乃至科学技术本身产生了严重的疑虑和恐惧，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憎恶，并随之不同程度地掀起所谓的“反科学运动”。其实，这种对于科学技术的反应首先是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开始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巨响，使科学家大为震惊，促使他们认真反省科学技术的后果。尔后，这种反应逐渐波及广大公众，带上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并且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溶入西方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潮流之中。加之嬉皮士、灵学、算命、看风水、学禅、易经热、信仰UFO和外星人等现象作为其附庸，反科学运动具有一定的规模、声势和群众基础。反科学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科学家强调科学的伦理问题，尤其是科学研究者的专业伦理问题以及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时的伦理问题。第二阶段从伦理转向政治，从而提出了有关科学技术的政治问题，即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审视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的互动关系，此时有许多社会学性质的著作出版。第三阶段出现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以及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掀起的群众运动，例如各种反核示威和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具体行动。我这样揭示反科学思潮的实质：

反科学主义者对科学进行新浪漫主义批判。但是，他们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方案，只劝诱人们“向后看”，去憧憬“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去恢复“好德乐善而无求”的纯朴古风。这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是开历史的倒车。因此，这种对科学的新浪漫主义批判只能

“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尽管它有时也以辛辣而尖刻的口吻击中科学主义的要害和现代社会的痼疾，但是由于它完全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我在文章中还分析，反科学理论基础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科学主义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它没有看到科学与技术是大不相同的：科学在伦理学意义上是善的，而技术则是一把双刃刀。它更看不到，自然技术的误用或恶用并不是自然技术本身的罪过，更不是自然科学的罪孽。第二，反科学主义低估了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或物质价值。第三，反科学主义忽视或误解了自然科学的精神价值。第四，反科学主义无视自然科学的人文精神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汇流的趋势，无视自然科学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有效手段。第五，反科学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因噎废食，根本行不通。我最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表了如下评论：反科学主义及其运动虽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形成一定声势的，但是它在发展中国家也不是没有市场的。要知道，反科学主义思潮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落后成分和非科学因素不谋而合的，如根深蒂固的旧价值观念，封建主义意识的残余，非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教育方式，经验主义的优势地位，单纯注重实用性知识等等，其合流的实质是反对运用科学技术发展民族文化的大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警惕和遏止反科学主义思潮的蔓延，而不能对作为反科学主义附庸的东西津津乐道。当然，反科学主义有助于打破“科学万能论”的神话，同时也可唤醒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意识，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成果误用或恶用的警惕。^①

1998年1月27日，我为在台北出版的《皮尔逊》一书所写的后记中，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针对反科学评论说：

① 扈丁（李醒民）：《反科学主义思潮评析》，《哲学动态》1990年第11期。